

在狮泉河畔读懂生死

——毕淑敏阿里题材作品简论

文 / 潘 兴



毕淑敏在当代作家中显得有些特殊，她属于“斜杠中年”，她并不是以职业作家的身份出道，她是在经历军人和医生两种身份后才进入到文学创作领域，1987年《昆仑》发表她的第一篇小说《昆仑殇》时，她已三十五岁，尽管后来未在从事内科医生的工作，但在主攻文学创作的路途上，仍然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与作家的身份一道组成她生活的复调。她的作品基本就取材于她的工作经历，伴有非常强烈的人生原初质感，真实性是她创作的鲜明特色，如果要追溯这种真实性的生发，就必须从毕淑敏早期作品看去，而回望毕淑敏的早期作品，有一个地方是绕不开的，那就是共和国海拔最高的一块领土——阿里。

一

毕淑敏1969年入伍，1980年转业回到北京，从17岁到28岁，她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工作了11年的时间，她“人生最宝贵的日子”都在阿里度过，阿里岁月给她的人生态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自然当她提笔开始写作时，第一次的流露就是书写她自己亲历的十一年高原岁月。她的作品序列中大约有7部中短篇小说以阿里为直接书写对象，1987年的《昆仑殇》，1988年的《补天石》，1990年的《雪山上的少女们》，1992年的《冰雪花卉》，1993年的《阿里》，2001年的《藏红花》，2008年的《银牦牛尾》。

我们在理解这些作品的内涵前，有必要就这些作品的叙述技巧开展简要的分析，特别是这些作品的开头。《昆仑殇》是以一个俯瞰的角度开始叙述的，由昆仑山地区出现的一条奇异曲线引出高原拉练的前因后果。《补天石》是以一场车祸的发生将小说的“唯一主角”朱端阳推到了故事的最前线。

《藏红花》则是以对国界的概念表述，自然切换为一个国境线的远镜头并逐渐拉近到高羔子和田久麦两人身上，此处看似闲笔但却殊为重要，高羔子遭遇敌人黑枪牺牲正是凸显了围绕国境线展开的殊死斗争，让读者真正理解何为国界。《银牦牛尾》则是以周云墨爬上十步棋哨所主峰的运动画面揭幕，然后才开始叙述将女卫生员分头开展边防站巡诊的原因及周云墨来到一号哨位的所见所闻。这四部小说的开头间接说明了毕淑敏小说的一些特点，就是注重以视角的深入获得一种进入故事的纵深感，形成一种渐进的过程，而这样的渐进的过程又自然而然的带来了运动感，使得小说处于一种灵动的状态。

《雪山上的少女们》《冰雪花卉》《阿里》因叙述聚焦都以第一人称出发，所以单独归为一类，不过这三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也各有不同。《雪山上的少女们》比较近于小说化的散文，“我从小就很想当兵”的开篇完全是个人内心的自白，自传色彩较为浓厚，包括“我”在别人口中又被称为“小毕”。《冰雪花卉》中的“我”就是“我”，没有掺杂其他成分，但也因此“我”必须如实扮演一位叙述者的身份，因为这个故事的最终落脚点是在小宛为牺牲的林参谋雕刻的冰雪花卉上。为此，包括故事的起点也是以一个古怪的开头，“我喜欢去寿衣店”，来引起听众的疑问。《阿里》中的“我”则有另外一个分身——“周一帆”，这样一种设计既是与《冰雪花卉》相同，保持作为叙述者的客观，更是一种“障眼法”，因为《阿里》的真正主角并不是“我”，而是“游星”，“我”的篇幅占了很大比重，但是草蛇灰线中隐藏着的都是“游星”的踪迹。这三部作品的一个特点都是带有回忆性质，即便《阿里》的开头是一个关于看信的情节，但无疑信这个特殊的载体，是如潮水般的回忆最好不过的开关阀门了。

二

毕淑敏的阿里题材作品除了在填补阿里文学描写空白的开创性意义以外，更在于这些作品对于阿里对于西藏对于高原所完成的名词化书写。何谓名词化书写？有必要提到另外一位作家——阿来。“西藏是一个名词，但在人们心中，西藏似乎变成了一个形容词”，阿来是较早注意到西藏书写中

所出现的形容词化现象，所以历览他的作品，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作品，都可以感觉到阿来力求实现对于藏区书写的名词指向，实现对于西藏的“祛魅”。进一步来看，从新时期文学开始以来，关于西藏的书写其实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 80 年代的理想主义高扬时期，一个是 90 年代的市场经济汹涌时期。理想主义高扬阶段虽然在描写之中也不可避免的伴有部分想象以及形容词化倾向，但因为具有反思因素的时代特色，使得 80 年代的西藏书写更介乎于名词与形容词之间的交替变奏，是一个中间态，但是到了 90 年代，乃至于今天，商品经济的惊涛骇浪席卷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重要部分——西藏文学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情况成了一种常态，某种程度上，不光是西藏文学牵涉到了名词与形容词取向的命题，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也在面临名词与形容词取向的选择。90 年代伴随旅游业等文化产业的兴起，巨大的市场潜力驱动着相关衍生品的生产，因此西藏成了“香格里拉”，成了饱受现代后现代文化喧嚣的都市中人的心灵避难之所，而大众的通俗文艺作品就成了完成西藏书写形容词化的最好载体，一大批有关西藏“香格里拉想象”的书籍在出版市场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西藏热”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图书销售中的一个热点，比如近几年出现的大冰。音乐作品中的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或可从郑钧的《回到拉萨》算起，当然也必须看到，即便是对于西藏形容词化的作品水平也是有良莠之分的，比如大冰的作品和《回到拉萨》可能就不在一个频道或维度上。

其实，论述西藏书写的名词化和形容词化并不是一个生死抉择，并不是说名词化和形容词化孰优孰劣，辩证来看，它们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在写作的最终目的上，名词化和形容词化都有可以达到的文学效果以及感人力量，而且名词化与形容词化之间本身就具有转化的相向运动，名词化的在地性

能够让形容词化更加真实可以把握，而形容词化的抒情本质则让名词化文质彬彬，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西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固有的特殊性，就能够理解西藏的当代文学书写在名词化和形容词化的 DNA 螺旋式结构上升的本质，但是要实现西藏当代文学的良性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两者的比例问题，特别是落实到作家具体的作品写作上，就更要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特别是要对形容词化的取向保持警惕，中国文学有抒情的传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因此更要学会对于情感的克制。

西藏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主旋律的书写，就是事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书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书写，而要完成这样的伟大书写，就必须与时俱进，就必须抛弃机械性的概念式图解，完成共名和无名的双向关注，既有宏观指归又有微观关怀，既不让指泛滥无序也不让所指淹没个体。实现对共名的无名的双向关注，就是要完成对名词化和形容词化的折中，当然要实现鱼和熊掌的兼得是需要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的，甚至其中还带有经历的必须，而经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经历在西藏书写的过程中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只有真正来到这片平均 4000 米以上的土地并且生活于其中较长的时间，才能真正体会到西藏的氛围而落笔于纸上，这种氛围不是半年的采风游历或一年的体验生活所能达致的，这种氛围其中所蕴藏的生死爱欲以及生活于高原之上人们的幸福哀伤相聚离别都是只有真正融入其中成为一分子的写作者才能够感受到的，作家生活（注意是“生活”，而不是“在”和“到”）于西藏的时间长度就成了衡量这种氛围感受度的重要指标。毕淑敏于阿里生活的 11 年长度也正成了她阿里书写的成功所在。

三

狮泉河是毕淑敏阿里书写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它显得似





有似无，有时难以捉摸，比如在《补天石》和《昆仑殇》中更像一个功能性角色，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另一个舞台，但是狮泉河在总体上来看其实是一个隐喻。狮泉河水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因为它非常的纯净，是“水的一种至高无上的状态”，而狮泉河水的至清无暇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压迫和净化”。狮泉河水是来自于未被污染的冈仁波齐净土，由于人迹罕至，那里保留了自然界的原初状态，如果与人对应的活，狮泉河水在阿里的流淌就如同人生十六七的青春芳华，而青春永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会给人的成长带来的巨大的压迫和净化，这种“压迫”是青春的爱而不得和成长烦恼，这种“净化”是青春的前方路途和恬淡寂静，特别是当这种青春发生在海拔高企的大地山河间，就更会迸发出青春成长的生命之力。

阿里的青春具有磅礴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提前了时间，加快了速度，让此时的少年们就要直面彼时的生死，人生的下一课过早在他们面前展开，他们必须学会告别，完成痛苦的蜕变，直到长大成人。《补天石》中徐一鸣与朱端阳互生情愫，但却只能斩断爱情，朱端阳后来又遭遇到了尤天雷牺牲的打击，但“大河没有死！高山上的雪水，还会给它以活力”，朱端阳通过完成解救朝圣老人的首例高原输血任务而实现自我成长的升华。高原的青春是残酷的，要让我们在很小的年纪就要对牺牲拥有最直观的体验，但缅怀却是可以让我们与牺牲之人再次相见，“我相信在一个春天的晚上，天上有着圆圆的月亮，班长定会和他相片上的未婚妻，在烈士陵园的台阶上相会，每人嘴里含着一块糖”（《雪山上的少女们》）。甜，是人生之诗的本义，是逝者向生者传达的生生不息。

共名和无名同样是描绘青春时作家需要认真处理的一对关系，由于某种审美反叛的需要，无名的写作呼声在一段时间里远超过了共名，但平心静气而论，处于现代后现代交织的中国当下，更需要共名的宏观调控，才能实现共名和无名

的同频共振，毕淑敏的阿里书写就把握好了共名和无名的共振脉络，其中祖国的形象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小说中完成了矗立。这种祖国形象的矗立，与这7部小说中基本都涉及国境线的描写有直接关系，这些描写会让读者体会到，国境线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细线，更是对国家主权和荣誉的确认，这条地图上的细线不是由墨水画成，而是由守卫在国境线上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具体的人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边疆，就是因为“世上万物都是有籽的，咱们就是祖国的籽”，祖国是母亲的化身，来到边疆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妈妈。毕淑敏对于国境线

意义的把握是非常深刻的，在《藏红花》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田久麦有些憧憬，说：“会挥手吗？”田久麦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边防军人在国境上遇到了，会有这种举动。

高羔子让田久麦在前边开道，田久麦蹿起的雪雾呛进了他的喉咙。他吐着雪沫子说：“挥手？从来没有过。要挥，也是左手。右手一直抠在枪机上。”

保持在戒备状态的右手，这样的描写就具有了深度，而此种深度也许是只有生活在战斗前沿和第一线的作者才能感受到的。因此，与毕淑敏的阿里书写相比，过去一些对于国境线的想象附会之作就显得苍白无力，所谓的人性化描写可能只是一种对历史现实的误读。

永远都无法忘记《阿里》最后的结尾：

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一片未定国界。有一天，要正式勘定边界了，也就是说，要在高原上打下第一道篱笆。中国的代表骑着骏马在高原上飞驰，告诉游牧的人们：明天若是外国人问起这片土地的名字，就告诉他，这里叫作“阿里”。消息在高原上以风暴一样的速度传开。第二天，正式勘界，牧民们异口同声地呼唤：阿里！阿里！

“阿里是什么意思呢？”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遥远的地方问。

“阿里的意思就是‘我的’，‘我们的’。”那女孩轻轻地回答。

阿里是“我的”，是“我们的”，它与“我们”融为一体，“我”即是阿里，阿里即是“我”，“我”所有的情绪，阿里与“我”一同感受，当“我”的情绪化为无言的风时，我将去往喀喇昆仑，在喀喇昆仑我将永生，因为那是祖国的赐予。

【作者简介】

潘兴（1991—），男，汉族，四川乐山人，硕士研究生学历，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助讲，主要研究方向：西藏当代文学。